

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

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王柯 ● 著

雍正在这里提到的湖南、湖北的夷狄之地，正是雍正强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地区。正如安部健夫曾说的：“改土归流还是一个借苗族的汉化，证明‘华化’能够实现的活广告。”总之，雍正时期清朝实行的改土归流，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王朝对周边





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
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王柯 ● 著 冯谊光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王柯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

ISBN 7-5004-2958-4

I. 民… II. 王… III. ①中华民族-关系-国家 研究②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14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謹以此書獻于亡妻村越より子灵前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三重的天下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5)
一 “四海之内”与“九州”——理论上的“天下” 与现实中的“天下”	(6)
二 “内服”与“外服”——阶级制“天下”的 成立	(15)
三 “中国”与“四夷”——统一“天下”的有机 组成	(22)
结论	(28)

第二章 文明论的华夷观

——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31)
一 “华夏”与“蛮夷戎狄”——是民族还是文明 共同体	(32)
二 “四夷”和“礼”——民族歧视的构造	(36)
三 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为渠道的民族 膨胀	(41)
四 “天下”与“德”——多民族国家形成的 基础	(49)
结论	(54)

第三章 万里长城的内外

- 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 (57)
- 一 秦帝国的“属邦” (58)
- 二 汉帝国的外臣和内属 (62)
- 三 从“兄弟之国”到“臣国” (69)
- 四 儒教与夷狄 (76)
- 结论 (82)

第四章 分治与同化

- 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
思想 (84)
- 一 从单于到皇帝——胡人在政治上的变化 (85)
- 二 从夷狄到华夏——胡人文化与民族的变化 (93)
- 三 从游牧到农耕——胡人社会经济的变化 (101)
- 结论 (105)

第五章 多重的帝国和多元的帝国

- 唐、辽、元的国家和民族 (109)
- 一 羁縻与和亲——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 (110)
- 二 一国两制和两国一家——辽代的南北面官
制度 (119)
- 三 中国化与二都制——元代的政治构造 (128)
- 结论 (136)

第六章 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139)
- 一 国家主权和土司土官 (140)

二 土司地区的“中国化”	(147)
三 “改土归流”和清朝的“华夷”认识	(152)
结论	(158)

第七章 在中华与“乌玛”之间

——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统治	(161)
一 从“招服”到“征服”	(162)
二 分割统治和伯克制	(165)
三 满族皇帝之民的诞生	(169)
四 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	(176)
五 “新疆建省”与维吾尔社会的变容	(180)
结论	(184)

第八章 构筑“中华民族国家”

——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186)
一 “驱除鞑虏”——“中华”在近代的再认识	(187)
二 “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回归	(194)
三 “积极的民族主义”——大中华民族时代的 开始	(201)
四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建设国民国家 的思想与实践	(208)
结论	(216)

第九章 二重的中国

——近代中国人的边疆思想	(218)
一 新疆政治独裁的成立	(219)
二 中国人心目中的新疆问题	(225)
三 边疆对于国家的意义	(231)

四 中国人的边疆危机感·····	(237)
结论·····	(243)
第十章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定过程·····	(245)
一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 设想(1922—1937年)·····	(246)
二 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自决论”的质变 (1937—1945年)·····	(253)
三 “联邦制”的否定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 (1946—1949年)·····	(260)
结论·····	(266)
结语 传统与现代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和实践·····	(268)

绪 论

1999年3月到5月，对于一切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政治研究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思考的季节。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小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北约科索沃问题到驻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北约公然袭击，使我们不得不对今天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任其所好、随心所欲之时，近代以来一向被视为国际关系标准的“主权”、“领土”，究竟还有多少价值？所谓“民族独立”，因为破坏现有的国家构造，自然要危害其他民族的利益，所以必然引发民族间的纷争，给各个民族都带来灾难；所谓“民族独立”，是国际霸权主义在“保障人权”的幌子下，向对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主权国家进行各种攻击，甚至武装干涉的最好借口。然而，所谓“民族独立”，因为破坏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所以除非中央政治权力出现真空状态，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同意。顺便提一句，即使在此次攻击南斯拉夫中与美国走得最近、表现得最为积极的英国，事实上也不肯承认北爱尔兰人民的独立。

由于近现代史上留下的被侵略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由于在今天通向国富民强的道路上国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政府

也不可能接受由任何方式的“民族独立”造成的国家分裂^①。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以两条主线融会贯之，这就是民主主义的主线和民族主义的主线。尽管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民众与为政者之间会发生冲突，但是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民众却会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比政府表现得还要警觉，反应也更加激烈。所以，一个政府，要想维持它的统治地位，必须是国家主权的维护者，同时也必须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②。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中国越来越强盛，政府越来越明智，国民的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至少从新中国50年的历史来看，在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中，某些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倾向却逐渐抬头，而且势力越来越大。有许多人推测，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将成为21世纪中困扰中国的最大难题^③。

民族问题的最强烈表现，不外乎打破现有国家构造，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运动。许多国外学者在谈及中国发生的民族问题时，都将它的根本原因笼统地归结于所谓的“中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即汉民族的民族歧视思想。其实这种说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说明中国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性质。因为它无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地理空间上蔓延扩大才得以在历史空间上绵延不息的历史事实，也无视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事实。

① 王柯：《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民众が支える民族主义》，《读卖新闻》文化栏，1997年3月10日。

② 王柯：《中国で“民族”再考の机运——“国家”意识高まり、传统文化を再评价》，《读卖新闻》文化栏，1999年10月25日。

③ 王柯：《モンゴル・チベット・东トルキスタン独立运动》，每日新闻社《エコノミスト》1997年1月27日；《ウイグル人の独立运动とは》，《中央公论》1997年5月号，中央公论社。

所谓的“中华思想”（且不论此词是否恰当），并非近代以来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其对象当然也不仅限于某个民族。但是事实上，只有地处西部与北部边疆地带的西藏、新疆与内蒙古地区，也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发生民族独立思想和运动。而就其他的少数民族而言，尽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今天却没有出现类似西藏与新疆地区那样激烈的现象。许多亚洲国家的民族问题，实际上都是一种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后遗症^①。很明显，近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发生，虽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其原因也不是仅仅用所谓“中华思想的恶果”一句话就能够梳理归纳，一了百了的。

在中国，从古到今，“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本书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各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并进而思考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②。

出于以上考虑，本书将采用一种从制度到思想、再从思想到文化的研究步骤。即首先通过研究一个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来看它是否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或以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为目标；然后，通过具体研究它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和政治行动过程，来看它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① 〈“国民”と“民族”の狭間で揺さぶる多民族国家〉，朝日新闻社アエラ・ムック《アジア学の見方》，1998年。

② 由于“中国”一词成为正式的国家名称，“中国人”成为正式的国民名称，都是到了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它们也常常被用于表示一种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意义。本书在以下各章节中，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也使用这两个词语，但在它们更多地表示地理的和文化的意义时，将加以括号，处理为“中国”、“中国人”。

并从中看它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最后，通过上述有关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和实践，既看它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看它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进而寻找和发现中华文明中支持这种思想的基因。

因为研究的具体对象，首先集中于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和政治行动过程，所以本书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更加接近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这是力求“论从史出”的必然结果，笔者相信，只有避免“以论代史”，才可以加深读者，以及笔者本人对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和宏大思想的认识。

过去虽然也有过探讨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著作，但是因为多属合著，尽管可能也会有统一的思想主旨，然而因为每个著者只负责一个时代，即使有所意识也由于现实的原因而无法写出一个王朝的民族政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因而全书也就不可能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关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思想的全息图景，甚至是一条理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思想的系谱。本书研究的年代之所以斗胆跨越了上下三千年，就是因为只有追溯到此时，才能够找到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并说清楚其本质；就是因为只有按时代顺序逐一探讨，才可以看到各个王朝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及其思想史上的前赴后继，才可以看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及其思想的历史连贯性。所以笔者认为：这样一个没有过的实践，虽然是一个危险的实践，然而却是一个有意义的实践。

第一章 三重的天下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古代中国历史学常常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只列有“五帝本纪”，并明确指出“三皇”时代只是一种传说，不足称史。“三皇”，即天皇、地皇和泰皇，泰皇又称人皇。显而易见，所谓天、地、人三皇及其时代，不过是远古时代“中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一种概括和想象。但是，这种概括想象，却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人”的一种最原始的、素朴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空间与时间相通，人间与天、地相联。人类世界，不是人类独自的家园，而是人类与天、地共存的空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天、地共同度过的时间；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规律，也处处体现了天、地的意志。

远古时代“中国人”的这种素朴原始的思维，奠定了“天下思想”的基础。因为在物质的层面上，人类社会与天、地构成一个须臾不离的大宇宙，所以在精神的层面上，人类社会自身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有天有地的小宇宙。天下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空间上展开的国家构造，或是在时间上展开的王朝更替，都受到天下思想的影响与制衡。因此，当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追

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时，首先就要从“天下思想”看起。

一 “四海之内”与“九州”——理论上的 “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

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天”的思想形成之后，天下思想才有可能形成。关于“天”这一概念的形成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周代^①。但是如果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文献的说法，还可以上溯到更加古老的年代。比如，《尚书》尧典篇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一文，记载了中国进入国家社会时代以前的天的概念。

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尽管三皇时代属于一种想象和概括，但是关于“五帝”（黄帝，炎帝，尧，舜，禹）的传说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中国历史传说中，关于“五帝”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生活时代、生活地域、活动内容等都距事实不远^②。因为五帝中的最后一人“禹”，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创始者“启”的父亲，因此一般认为五帝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前国家社会时代。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王朝第五代统治者——少康曾“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曾有学者经过研究，断定《尚书》的盘庚篇是商代的文献^③，而盘庚篇中也有“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一文。总之，天的概念很有可能产生在周代之前。

在甲骨文的商王卜辞中，已可以看到“天”字出现。甲骨文中的“天”，虽然大多表示“大”的意义，但也有像“庚辛王弗

① 平冈武夫：《经书の成立》，创文社1983年版，第175页。

② 谢维扬：《中国古代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8页。

③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病朕天”那样作为“人之巅峰”被使用的例子^①。在甲骨文中，“天”的概念在很多场合是由“帝”字来表示的^②。这种观点也可以通过其他先秦文献得到证实，例如，《诗经》商颂长发篇中的“帝命不违”的“帝”就可能是“天”。

郭沫若曾指出，商代人以天为卜问对象，卜辞中的“帝”指的是至高神^③。也就是说，“帝”只不过是具象化了的“天”而已。然而，如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个具象化思维过程的深层，实际上有着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帝”原本是一个将祭祀物品置于高架之上焚燎的指事文字，从这种祭祀者将祭品放到高处焚燎的行为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以下两点。首先，从客观上来看，祭祀的对象是一个从空间位置上高于人间的存在；而这个高于人类、高于人类生活空间的存在，实际上也只能是“天”。其次，从主观上来看，祭祀的对象——“天”，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神圣的存在；所以祭祀者甚至希望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抬高祭品使之尽量接近“天”，以便能够让天更加清楚地“看”到、“尝”到或“嗅”到自己对于天的敬畏。从先秦时代中国人关于祭祀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尽管无从断定具体的时间，但是毫无疑问从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所谓“天似穹庐”，天，就像是一个圆形的帐篷顶一样笼罩在近乎方形的大地之上。这样，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物质存在，自然都被覆盖在同一个、惟一的天的下方。从高度上看，世界处于“天”的下方；从广度上看，世界整体被“天”所笼罩。古代

①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9067。

②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③ 郭沫若：《青铜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天”与世界的直观的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来自于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同时也会导致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这些主观结论，也是天下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

在夏、商、周代，祭祀和占卜都是一种王朝的重要政治行为，也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特权^①。由此可知，“天”的思想在当时主要是被用来解释政治权力的性质。

首先，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统治世界即“天下”，其最终的依据是“天命”或又被称作“帝命”的天的意志。其次，因为只有一个“天”，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即正統的王朝。最后，“天下万物”，即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由“天”选定、受命于天的统治者。比如“予迺续乃命于天”^②，说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③，说的是周的统治是受命于天。《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的是“中国”周边的民族共同体也都服从于作为正統王朝的商王朝。“享”，也是一个将煮熟的食物高举着进行祭祀的指事文字。“来享”指的是来参加由商王朝主持的祭典，“来王”说的是来到商王朝朝见商王，对于来朝者来说，它意味着承认了商王对自己的统治权。主祭者之所以能够被承认是天下的领袖和最高统治者，是因为祭祀是沟通人与天之间的桥梁，所以只有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天的意志的主祭者，才有可能反映出天的意志。这个事实反映出“天下”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即天下最高统治者受

① 贝塚茂树：《中国の古代国家》，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145页；同谢维扬前书，第325页。

② 《尚书》盘庚。

③ 《尚书》孟鼎铭。

命于天，他的权力的性质，是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

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有过许多建树的贝塚茂树，曾经针对商代占卜的性质指出：“用卜询问天帝意志是殷王的特权，它意味着殷王就是天帝在地上的代理者”。这段话，实际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祭祀的性质。在这段话的后面，贝塚茂树接着说道：“到了周王朝时，王是天帝之子即‘天子’，是一个将天上‘帝’的意志传达给地上人间的中介的观念已很明确。《尚书》召诰篇中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一文，是说殷作为皇天的元子即嫡子的命令被天帝取消，才是殷亡国的理由。这种认识，应该是在殷人原有的观念的基础上，被周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的”^①。

贝塚茂树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从《诗经》商颂长发篇中的“帝立子生商”一文中，的确可以看到商代“天子”思想的萌芽。但是，明确地将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看作“天”的子嗣——“天子”的认识，还是要到周代的文献中才能得到确认^②。有人认为，“帝”与“享”本来指的是祭祀祖先的仪式。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从祭祀方式中关于高度的意识来看，很可能是“祖先”被抽象为“天”，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的认识，就来源于这个抽象化的过程。

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经》商颂殷武篇中“自彼氐羌”的氐与羌，都是周边地域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天下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周边民族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先秦时代

① 同贝塚茂树前书，第145页；同谢维扬前书，第325页。

② 同王宇信前书，第180页。